



“军中赵子龙”杨成武

张家口打响平津战役

1948年11月,随着辽沈战役的胜利结束和淮海战役的发展,国民党位于平津地区的傅作义部队已经处于分割包围、孤立无援境地,失败结局早已注定。为防止国民党华北军队西退绥远和海路南撤,不利于随后进行的渡江战役,中央军委明确提出“抑留并歼灭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地区”的作战方针,制定了“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战役原则,即在西线首先攻克新保安、张家口,在东线解放天津,截断国民党军队西退南撤通道,争取在华北地区就地歼灭国民党军队。

为了实现上述的作战方针,中央军委命令华北军区第三兵团首先包围张家口,切断傅作义集团西逃绥远的道路,吸引傅作义派兵西援,使我军牢牢掌握平津战场的战略主动权。1948年11月25日,杨成武率领第三兵团第一、第二、第六纵队由集宁地区东进,于29日向张家口外围国民党军发起攻击,打响了平津战役第一枪。战至12月2日,第三兵团对张家口形成完全包围态势。12月24日,第三兵团发起总攻,将压缩在大境门外西甸子、朝天洼、乌拉哈达、黄土窑约10公里长、0.5公里宽山沟内的国民党第十一兵团全部歼灭。是役,杨成武指挥第三兵团共歼灭国民党军队6.5万余人,俘敌将级军官13名,创造了当时华北地区一次作战歼敌之最。

文登川力破“坦克劈入”

朝鲜战争爆发后,杨成武奉命入朝,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1951年9月,美军倚仗装备后勤优势,分别在朝鲜半岛东、西两线发动了“秋季攻势”。10月,美军在东线集中6个师兵力向金城、文登川一线发动攻击。彼时,杨成武率领的第二十兵团刚刚与朝鲜人民军换防,地形特点、敌军军情、战场态势都不清楚,仓促应对美军猛烈进攻。美军为发挥装备火力优势,在攻击志愿军防御阵地时,运用所谓的“坦克劈入”战术,即每次以20~40辆坦克组成一个集群,在大量飞机掩护和步兵、工兵伴随下,一面以阵地上的火炮和坦克炮实行密集射击,一面沿山路迂回割裂志愿军前沿防御阵地,再由其步兵“逐山占领”。我第六十七军一个连(排)防御阵地,每天除了遭受各类飞机多次轰炸扫射外,还要承受1万~3万发炮弹的轰击,要抵挡坦克集群与步兵协同的反复冲击,以血肉之躯顽强抗击美军的坦克楔入。在美军强大攻击势头下,杨成武指挥部队采取边打边补充、边抢修工事、白天失去的阵地夜间反复夺回的办法,与美军进行殊死争夺,决不放弃任何一寸阵地。经过3天恶战,第六十七军顽强顶住了美军的疯狂进攻,击破了美军的“坦克劈入”,打出了志愿军的威风胆识,使文登川我军防御阵地固若金汤,成为美军难以逾越的钢铁壁垒。



杨成武是新中国首次授衔的上将,福建省长汀县客家人,在70多年革命军事生涯里,从一名普通农家少年成长为为我党我军智勇双全、能征善战的“百战将星”,被毛泽东称为敢打头阵、勇当先锋的“军中赵子龙”,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和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 卓翔 高湘媛 据《学习时报》

长征路勇当“开路先锋”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全面失利,中央根据地已到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开始了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途中,杨成武任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政治委员,先后与团长的耿飏、黄开湘共事,率领红四团担任长征前卫先锋,肩负为中央红军打开前进通道的重要使命。

杨成武带领红四团快速突破国民党重兵拦截的四道封锁线,血战湘江,鏖战乌江,激战娄山关,为党中央召开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提供了重要安全保障。特别是1935年5月27日,杨成武带领红四团从安顺场出发,克服山高

路险、频繁作战、极度疲劳的重大困难,以一昼夜240里的强行军速度赶到敌军严密防守的泸定桥,组织22名突击队战士,冒着守军密集火力,攀踏河上悬空铁索,穿过桥头熊熊烈焰,飞夺泸定桥,为身陷重围、四面受敌的红军打开了渡河突破口,使中央红军顺利渡过天险大渡河,彻底打破了蒋介石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痴心妄想。飞夺泸定桥后,杨成武又率领红四团翻雪山寻路、过草地探道,突破天险腊子口,出色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前卫任务,多次受到中革军委的嘉奖和毛泽东的表扬,为中央红军胜利完成长征立下汗马功劳。

黄土岭击毙“名将之花”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杨成武作为“红大”第一期学员提前毕业,奔赴抗日前线,先后担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独立团团副、独立第一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雁宿崖战斗、黄土岭伏击战等一系列抗击日军战斗,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受到根据地老百姓的广泛称赞。其中,杨成武亲自指挥的黄土岭伏击战,击毙了日军“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官阿部规秀中将,是日军侵华战争以来被击毙在战场上的第一个高级将领,震惊了日本朝野。

黄土岭位于涞源和易县交界处,是太行山北部群山中一条五里长山谷,周围被高山险峰环绕,地形特殊、地势险要,是八路军隐蔽兵力伏击日军的理想战场。1939年10月中旬,日军调集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第一一〇师团主力共2万余人,对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北岳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企

图一举围歼当地八路军主力部队。11月7日,时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的杨成武利用日军骄横狂妄、急于求战的心理,安排地方游击队及小股部队将日军引诱至黄土岭,并指挥主力部队趁着夜色进入伏击阵地、隐蔽待敌。等日军全部进入伏击区域后,杨成武率领部队突然发动攻击,使得放松警戒、无处藏身的日军死伤惨重,被压缩在一条长约二里、宽仅百余米的谷底狭沟。激战中,八路军进攻部队发现一独立房屋附近有一群穿黄呢大衣的日军军官进进出出,随即判定这是日军指挥部,立即引导军分区炮兵连进行炮火覆盖,当场击毙日军指挥官阿部规秀中将。阿部规秀是日军著名“山地战专家”,在日本军界享有“名将之花”盛誉,其被八路军击毙后,日本以《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通栏标题在报纸上连登3天。他的骨灰运回东京时,不仅所有高级将领和许多权贵都前往车站迎接,而且东京还降半旗以示哀悼。

胡适代言保险

20世纪初,保险在中国还是新生事物,保险业主体基本为外资、合资公司所垄断,其中人寿保险刚进入中国市场,国人对它的认识尚处于较为陌生的阶段。

1933年,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的胡适,应中华人寿保险协进社之请,欣然撰写了一则言简意赅的公益广告,发表在4月9日上海《申报》的“人寿保险专刊”第4期。其内容为:“人寿保险含有两种人生常识:第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壮年要作老年的准备,强健时要作疾病时的计划。

第二,‘日计不足,岁计有余’,所以微细的金钱,只需要长久的积聚,可以供重大的用度。”胡适笔下的这则广告篇幅短小,语言平实,含意深邃,以人们通俗易懂的文句,阐述了人寿保险兼具养老、医疗、储蓄、投资的功效,对宣传和普及保险知识,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胡适不仅乐于向国人宣传和推荐保险,他在生活中更是身体力行,率先购买人寿保险、财产保险,走在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参与保险理财的前列。1935年12月30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到浙江兴业银行,

到中孚银行,把寿险费及书籍保险费还了。”文字虽短,却印证了胡适拥有居安思危的保险意识,并且积谷防饥,将投保人寿保险和财产保险付诸行动,把自己的健康和个人藏书纳入年度保险计划之中。

1949年,胡适离开大陆定居美国纽约后,一度考虑参保医保,却因年老多病,被保险公司无情地拒之门外。他因此不无感慨地说:“美国资本主义很坏,我这个年纪大了后,我想保险,他们嫌我年纪大,嫌我心脏病……”以致他心脏病复发入院治疗时,一度连医疗费都难以筹措。

■ 周惠斌 据《人民政协报》